

晚清偽譯政治小說中的行動主義傾向： 以《自由結婚》為例

齊金鑫 (*Jinxin Qi*)

中國 中山大學

李德超 (*Dechao Li*)

中國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

摘 要

作為一本鼓吹暴力革命的小說，《自由結婚》披著翻譯的外衣，猛烈抨擊晚清政府與西方列強，體現出強烈的政治動機。而以翻譯的面目示人，可以使小說一方面吸引目的語讀者，另一方面規避權力機構的審查。對於偽譯者而言，「翻譯」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抵抗」甚至「介入」的手段。偽譯集中體現了行動主義翻譯，是其最激進的表現形式。以翻譯之名行革命之實，偽譯者充分利用目的語文化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將偽譯在社會轉型時期所能起到的變革甚至顛覆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Abstract

As a political novel that advocates violence against the Qing government by then revolutionists, *Free Marriage* brings severe criticism of the society to the fore. The novel, replete with strong political motivations, is under the guise of translation for two reasons: first, it can attract target readers due to the popularity of the translated works at that time; second, it can evade censorship from the authority. Translation is not an end but a means of “resistance” and even “engagement” for the pseudotranslators. Pseudotranslation is the quintessence and the most radical form of activism translation. By catering to the dominant ideology in society, the pseudotranslator brings the revolutionary or even subversive role of translation during transitional periods into full play.

關鍵詞

政治小說、《自由結婚》、偽譯、行動主義翻譯

(一) 引言

現多有研究表明，清末的文學翻譯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訴求，無論是偵探小說抑或是言情小說的翻譯（湯哲聲、朱全定 2014）還是詩歌的翻譯（王東風 2011），都對中國當時的政治、文化等產生了重大影響，林紓的翻譯對於現代性亦有促進作用（戴光榮 2018）。清末動盪政治時局中，文學翻譯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烙印，但翻譯如何影響甚至介入政治進程仍有待深入挖掘。

談及翻譯與政治的關係，自當繞不過這一時期政治小說的翻譯。自梁啟超（1997a）將歐美各國政界之進步歸功於政治小說以來，政治小說的創作與翻譯呈蓬勃之勢。政治小說譯作《佳人奇遇》、《經國美談》以及 1902 年創作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盛極一時。梁氏所謂政治小說的創作，「著者欲藉以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論皆以中國為主，事實全由於幻想」（新小說報社 1997，61）。梁在《新中國未來記》中即對未來中國進行了大膽設想，開篇即講述六十年後的中國已立於世界強國之林、新中國維新慶典萬國來賀的盛況，隨後敘述六十年來志士仁人的奮鬥歷程。梁所譯《佳人奇遇》拉開了晚清政治小說翻譯的序幕，與《經國美談》一併成為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重要譯作（鄒振環 1996）。學界對於該時期政治小說翻譯的研究成果頗多，有學者從現代性角度討論清末政治小說的譯介（楊淑華、王峰 2019），趙稀方（2012，74）認為梁氏所謂政治小說表現出明顯的「立憲傾向」，因此政治小說的翻譯體現出譯者明顯的政治訴求。

翻譯作為政治介入的載體和手段，已經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Tymoczko 2000），特別是行動主義翻譯研究者。行動主義翻譯中經常用到的兩個詞語是「抵抗」（resistance）和「介入」（engagement），前

者在描述翻譯學中具抵抗意味的物件和思想繁多，包括殖民主義、西方霸權、佔統治地位的話語或文學、語言學規範等，更多是一種「反應式」(reactive)而非「主動式」(proactive)的行為；而後者則暗示行動主義者所發起的各種行動，這些行動可能是基於對某些具體信念的堅守，也可以是對其他民眾的支援，體現了更積極主動的態度 (Tymoczko 2010a)。換言之「譯者－行動主義者」(translator-activist)即為「革命者」(revolutionary)，譯者通過翻譯「有意識地追求社會、政治或教育的變革」，「喚起讀者和聽眾起來行動」即可視之為「行動主義者」(activist) (Gould and Tahmasebian 2020, 3–4)。如果說翻譯作為「目的語文化中的事實」(Toury 2012, 23)，可以「削弱、質疑和顛覆權力結構」，「服務於行動主義者目的，對個人和(或)既有秩序帶來部分和(或)全部的改變」(Cheung 2014, 237–238)，那麼擺脫了「原文」束縛的偽譯是否體現出更鮮明的行動主義傾向值得關注。

清末時期的所謂「豪傑譯」，雖然譯者會對原作進行任意的改動，如改寫、增添以及刪節等，但仍然存在著原文，譯者仍會受到原文的制約。至於不存在原文的偽譯作品，偽譯者則擁有更大的創作自由度，他們是否會利用該自由度更直白的表達其政治訴求？這一時期的偽譯與政治進程的關係又如何？偽譯雖然「事實上錯誤」(factually wrong)但「功能上有效」(functionally effective) (Toury 2012, 58)，甚至可以發揮創作和翻譯都無法發揮的功效。如果說在晚清這樣特定歷史時期的偽譯和偽著，都「以各種面貌積極地參與主體文化文學的演進」(胡翠娥 2003, 81)，那麼政治小說的偽譯介入文學甚至政治進程中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本文試圖以偽譯政治小說《自由結婚》為例，分析偽譯者的政治動機以及該小說所表現出的行動主義傾向。該小說作為偽譯作品雖在一些研究中偶有提及(如胡翠娥 2003；張道振 2013；Hill 2011；Liu 2019)，但大都沒有對文本進行深入具體的分析，更遑論偽譯的「原文」以及實現形式等偽譯研究頗為關切的方面。本文嘗試採用文

本細讀的方式，結合相關偽譯理論，對該作品進行語境化還原與解讀，描述出該偽譯作品的實現形式、所對應的「原語」文本和文化，以及偽譯動機和目的，以冀勾勒出偽譯與彼時政治活動之間的關係。

(二)《自由結婚》與行動主義

2.1 偽翻譯《自由結婚》

《自由結婚》由自由社於1903年6月15日出版，封面寫明「猶太遺民萬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譯」。但據學者考據（阿英1996），此書實為張肇桐所作。另據張肇桐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同學馮自由記述，張為無錫人，1901年赴日留學，參與發起留日學生革命組織青年會，「著有小說《自由結婚》」，該小說是「鼓吹民族主義之作」（馮自由1981，68），反映了作者鮮明的革命立場和政治嚮往。

該書〈弁言〉聲稱：「全書以男女兩少年為主，約分三期。首期以兒女之天性，觀察社會之腐敗；次期以學生之資格，振刷學界之精神；末期以英雄之本領，建立國家之大事」（自由花1903，2）。該作品雖題為《自由結婚》，但主要內容並非描寫兒女私情，而是宣揚革命，因此封面上書有「政治小說」四字。小說流傳下來的只有兩編，第三編或已佚失，或作者未續。書中所敘國家「文明國」本是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文明古國，但國民卻都缺乏愛國之心，甘於被「異族」統治，過著亡國奴的淒慘生活，該國實行「盜主國體」以及「賊民政體」，進步男女青年黃禍與關關偶然相遇，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兩人都具有反帝、反清思想。

該小說由於是假託翻譯之名進行的創作，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關注。但小說的價值不容忽視。阿英（1996，102）認為晚清的所謂「種族革命小說」，雖然在藝術上有缺陷，但對讀者的政治影響是巨大的，這類小說的研究是「最不應忽略的」，典型代表作品

當首推《自由結婚》。郭豫適 (2001, 364) 稱該作品為「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小說」。該小說「從本質上概括了歷史的循環往復，是對傳統小說創作思想的重大突破」，其更頗具開拓意義，「以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為線索，貫串以愛國主義的主題，可以說是開了後世十分流行的這一小說程式的先河」，並同時將頗為抽象的政治概念，「化為可感可觸的日常生活體驗，主張『用尋常兒女的情，做那英雄的事』，這也是《自由結婚》之首創」(周鈞韜、歐陽健、蕭相愷 1993, 985)。可見無論是從影響以及文學創新方面，該小說都有重要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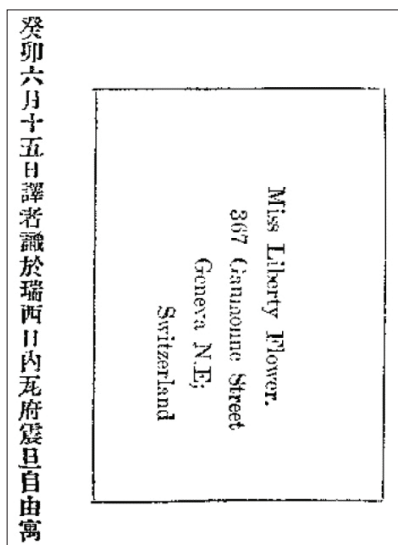
2.2 偽譯的實現形式

偽譯者為了使其創作被讀者視為翻譯，通常會在文本形式與表達上展現出某些特點，而這些特點在目的語文化中與翻譯相關，甚至是宣稱翻譯了某特定文本類型或譯自某個特定的原語 (Touy 2012)。對於目的語文化中不存在的某些體裁類型，偽譯者可以宣稱是譯自某種原語，比如清末時期第一篇偵探小說的偽譯，「譯者」利用目的語文化存在著體裁真空，宣稱為翻譯作品，實則創作了一篇偵探小說 (齊金鑫、李德超 2019)。而《自由結婚》的〈弁言〉中指出該書「關於政治者十之七，關於道德教育者十之三，而一貫之以佳人才子之情，今名政治小說，就其所側重者言也」(自由花 1903, 2)。梁啟超 1898 年在《清議報》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極力推崇始自「泰西人」的政治小說，認為「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梁啟超 1997a, 38)，雖然對於甚麼是政治小說，梁啟超語焉不詳，但自此打著「政治小說」旗號的作品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新中國未來記》、《回天倚談》、《瓜分慘禍預言記》、《新年夢》、《黃繡球》等，都反映了「政治小說」這種舶來品的受歡迎程度。《自由結婚》作者將其劃分為「政治小說」，可以說迎合了此類小說在社會的流行以及讀者對該類型小說的喜愛，也為宣揚革命理念提供了合適的外衣。

提莫志克 (Tymoczko 2010b, 234) 認為譯者會通過「副文本評論」(paratextual commentary) 來引導讀者的反應，對讀者的解讀以及推斷加以框定，從而實現自己意識形態方面的目的。而副文本也成為偽譯偽裝的重要手段。副文本指的是作品的「題目、副標題、幕間標題；序言、刊後語、通告、前言等；旁注、註腳、章節附註；引言題詞；插圖；書籍封面簡介，圖書封面」等各種資訊 (Genette 1997, 3)，副文本又可分為內副文本 (peritexts) 與外副文本 (epitexts)，前者指的是「依附於文本的外文本因素」(5)，如序言、旁注等；後者指的是「不依附於文本的外文本因素」(344)，如訪談、通信等。該小說主要通過內副文本來建構小說的偽譯形式。

作者為了讓讀者將《自由結婚》視作譯本，在內副文本即〈弁言〉中捏造英文書名及作者：「此書原名 *Faree Marriage* [sic.]，猶太老人 Vancouver 先生所著。余往歲初識先生於瑞西，先生自號亡國遺民，常悒郁不樂」(自由花 1903，1)。作者甚至用英文捏造了其住址(見圖一)。

圖一 《自由結婚》譯者地址



作者假託「猶太老人」之名創作《自由結婚》，該書寫實踐與中國傳統小說中的「假託」存在著一定的共性與區別。假託或託名現象古已有之，「託名傳道」的作偽動機到了晚明時期逐漸被追逐商業利潤而取代，晚明的託名白話小說多假託名人以獲得讀者的青睞（陳文新、毛偉麗 2006）。到了清代假託現象仍然盛行，清代小說《儒林外史》以明代社會為背景，實則反映的是清代生活，一方面可以躲避文字獄的迫害，另一方面托明事以寫當代為小說的創作提供了最大的便利（杜貴晨 2000）。與《儒林外史》假託時代類似，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亦被學者懷疑是假託人名，真正的作者一直隱而不露，目的在於逃避當時的文字獄（克非 2016）。可見中國傳統文學中一直存在的「假託」敘事模式，到了清朝時期，由於文字獄的興起，創作者利用假託的方式，隱藏創作目的或身份。偽譯《自由結婚》以激烈的語言抨擊當權者，號召民眾推翻「異族」政府，如創作者署真實姓名，會使自己處於危險境地，因此假託「猶太老人」，表面講述的是猶太民族的處境，便於逃避審查。

但偽譯作品的假託現象又與文學創作不同。中國古代文學中被假託者身份無一例外都是中國人，但對於偽譯作品而言，「翻譯」的身份又決定了被假託者是外國人，偽譯者捨棄中國傳統「假託」敘事，借由外國人之口宣導革命理念，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翻譯文學在目的語多元系統中的受歡迎程度。當然，翻譯小說雖然在晚清非常流行，但也不乏質疑聲音，認為翻譯小說對既有秩序和社會框架產生衝擊，影響了既得利益者（王宏志 1999）。雖然現存文獻沒有偽譯者張肇桐對待翻譯的態度，但也可以認為，作為革命者而非文學家，張肇桐捨棄了創作而選用「翻譯」，恰恰利用了翻譯對社會秩序以及價值的衝擊甚至顛覆作用。

作者也在〈弁言〉中煞有介事地敘說了翻譯時所面臨的困難以及採用的翻譯策略：「此書系英文，而人地名半屬猶太原音原義，若按字直譯，殊覺煩冗，故往往隨意刪減，使就簡短，以便記憶，區區苦衷，閱者諒之」（萬古恨 1903，2）。

出版社也推波助瀾，以「出版社附志」的形式，介紹了「譯」該書的來龍去脈：

是書為吾國自由花女士所譯。女士生於中國，自幼即懷大志，稍長，披閱史籍，痛祖國之淪亡……每有逍遙世外之想，遂以十二年之妙齡女子，偕其父赴瑞西……客歲本社主人有歐洲之行，曾於瑞西日內瓦府一見之……主人歸國後，數閱月間魚雁逕然，前月之杪，忽得女士手書，並其《自由結婚》第一編之大奇譯，如獲拱璧，喜不自勝。（萬古恨 1903，108）

作者以內副文本的方式，使讀者認為該小說為譯本。如文中猶太老人說道：

有一天，老夫上街去買東西，看見前面有一所房子，寫著幾個支那字，老夫心下想道：這個地方哪裏會有甚麼支那人。仔細一看，原來是震旦自由寓。暗暗稱奇道：這自由是我的秘寶，難道支那也有同我一樣的人不成？（萬古恨 1903，7）

所謂的「譯者」對這段話加了一個注釋：「你別太看不起支那人」。通過添加譯者注的形式，一方面「譯者」可以跳出原文以超脫的身份與所謂「作者」進行互動、發表評論，另外一方面也獲得了讀者的信任。

作者以評論的方式與文本進行互動在小說中比比皆是。小說描寫學堂裏一個老先生教導學生：「若是違犯堂規，不受訓斥，就同那大逆不道的罪人一樣，照例重辦。你們聽聽，可怕不怕嗎？」（萬古恨 1991，211）作者同樣以加注點評的方式強調自己是翻譯：「怕極了，怕極了！怕得我譯書的腳腳跳，將來還要怕得看書的腳腳跳」（211）。

雖說小說內容很難讓讀者相信是在談論外國，但「譯者」通過評論的方式將中國與小說中的國家「文明國」進行對比，又增加了翻譯的可信性。在談到「文明國」裏的少年最喜歡做的事情是「讀書上進，

小考、大考、做文章、做詩賦，一世五六十年，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到晚沒有一時一刻不拼著命為之」(萬古恨 1903，55-56)。這樣的描述很難不讓人想到中國的科舉制、八股文以及文人雅士所喜歡的詩詞歌賦，但是「譯者」卻添加了這樣的評論：「沒有八股，沒有試貼，比起我中國來，還要好一點兒」(55-56)。

梁啟超所翻譯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使得中國近代政治小說充滿了議論形式，議論成了作者最直接有效表達政見的方式(岳凱華 2018，42)。王宏志(1999)也曾指出，《佳人奇遇》欠缺故事情節以及人物描寫等小說進本元素，故事篇幅大部分用於談話上，此特點也體現在其後期創作的《新中國未來記》上。政治小說欲發揮應有效力，議論或演講最直抵人心。《自由結婚》也深受此影響，文本中充斥著議論與各種談話。不過與梁氏的翻譯和創作相比，該偽譯作品以「譯者」的身份在副文本中發表評論。這一特點也與同時期的翻譯有所不同。雖說這一時期的翻譯，譯者翻譯時添加原文中並不存在的評論並不罕見，但這些評論多是直接出現在文本中。而該偽譯作品也同時借用了副文本。偽譯者作為行動主義譯者，通過「提供詳盡的注釋和副文本評論，作為政治或意識形態材料的閱讀指引」(Tymoczko 2010b, 230)。因此，副文本在提高翻譯文本可信性的同時，也為偽譯者抨擊政府，宣揚思想、政治理念提供了便利。偽譯者通過使用副文本，創造了另外一個敘述者，與文本中的敘述相互呼應，無疑對讀者的閱讀提供了方向，框定了讀者的解讀，有利於作者強化自己的政治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主張，更有利於宣揚自己的革命理念。

2.3 偽譯對應的「原語」文本和文化

偽譯並非完全沒有原文基礎，偽譯的原文基礎「通常會對應整組的外國文本，甚至是該組文本的(可提取)模式，而非某個單一文本」，有時可以從偽譯文本中重構出「可能原本」中的「隻言片語」

(Tourey 2005, 6–7)。為了讓創作看起來像翻譯，偽譯者會模仿(虛假)「原文」，甚至會以「誇張」的方式體現「原文」，讀者因此甚至會激活這個並不存在的原文(Tourey 2012)。換句話說，偽譯文本與某個原語中的文本存在著互文性。但也存在著另外一種情況，即偽譯本是原創，「並不基於原本或受原本的啟發」(Rizzi 2008, 155)。通讀該偽譯小說可以發現，目的語社會中的現實在偽譯本中比比皆是。

清朝末年於中國而言是一個屈辱的時代：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慘敗，簽訂《馬關條約》；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當權者落荒而逃；1901年清政府與帝國主義簽訂《辛丑合約》，自此之後清政府完全淪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遂成為清政府的政策。除去主權及經濟上的掠奪，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污名化也隨之而來。小說男主角的名字「黃禍」不禁讓人想起西方侵略者對彼時中國人的污蔑。1901年，梁啟超發表文章〈滅國新法論〉認為所謂「黃禍」不過是西人「滅國之手段」(梁啟超 1989, 39)。而《自由結婚》以「黃禍」稱呼主人公，一方面可以激起讀者的憤慨，另一方面不避諱以此蔑稱稱呼主人公，但主人公發奮圖強，領導了反抗「異族」政府及侵略者的鬥爭，後期改名「黃轉福」，證明此時革命黨人已經認識到清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必須通過革命才能由「禍」轉「福」。

梁啟超創作的《新中國未來記》以及同時期其他政治小說多著眼於未來，體現了民族國家的想像(岳凱華 2018, 41)。《新中國未來記》講述的是1962年紀念維新成功五十周年大典、萬國來賀的盛況；陳天華的《獅子吼》描寫了五十年後舟山群島的故事。而偽譯小說《自由結婚》則立足當下。雖說作者以各種手段宣稱其為翻譯，但該小說中的敘述無一不影射中國，立足當下政治現實。黃禍在詢問父親生平時，其母答曰：

汝父諱人傑，少時曾經遊學外國，最精陸軍，官至總兵。汝生前三月，我國某地方起了一樁教案，外國人大怒，就要求政府屠殺那些仇

教的百姓，燒毀那些仇教的村莊。政府本是異族，哪來顧我國國民，自然一口應承了。（萬古恨 1903，24）

這很難不讓讀者想到義和團運動以及八國聯軍侵華。小說言辭之激烈超乎尋常，不僅有直接的謾罵，甚至直接號召民眾起來推翻政府。小說中借諷刺越王勾踐，來駁斥其臥薪嚐膽，強調民眾不應再委曲求全，對政府抱有任何幻想，應立即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統治。

小說還對康有為的「維新變法」進行了諷刺。如關關的母親說：「我所以看不起那一班維新黨人，就是因為他們只要錢不要臉」（萬古恨 1903，61）。戊戌變法的失敗已經證明君主立憲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但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分子在流亡日本之際，仍繼續鼓吹維新、宣揚君主立憲、反對武裝革命，引起了當時先進知識份子的憤慨，紛紛撰文予以駁斥。《自由結婚》一文即充斥著對維新派觀點的抨擊。按照阿英（1996）對晚清小說的分類，《新中國未來記》為立憲運動小說，《自由結婚》無疑是種族革命小說，兩種小說類型體現了作者不同的政治立場。在對待滿清政府的態度上，《自由結婚》與《新中國未來記》可謂針鋒相對，立憲派擁護滿清政府，為革命派所不恥，已成為革命的對象。

小說中的「洋人」也對「文明國」充滿了嘲諷。黃禍與關關無意間撿到一個風箏，誰知被一群小洋人毆打，污蔑他們偷了風箏，那群小洋人說道：

況且我們說你做賊，並非無因，我因為看見你們國裏沒有一個不是賊，就是今世不是賊，前世也是個賊。你們那一部愛國史記裏面，上下數千年熱熱鬧鬧，原來沒有甚麼別的東西，只是強盜爺爺相爭相奪的事情罷了……不用說旁的，就是你們現在深仁厚澤的政府，同那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哪一個不是大賊大盜？（萬古恨 1903，67-68）

這段描述實則反映了作者對當時政府的態度，但以洋人的口吻表達出來，更具震撼力、更能引起讀者的強烈憤慨。同時小說中也不乏

以「國人」口吻揭露政府以及洋人相互勾結的描寫，甚至是從身居要職的既得利益者口中說出，頗具諷刺意味：

幸虧你大人和洋人素來非常親睦，洋人貪著本省礦山鐵路的權，竭力保護你大人，所以我們仍得住在這個大大的衙門裏，偷安旦夕，苟延殘喘。近來你們大人要想照從前和洋人所訂的密約辦理，把本省礦山鐵路的權都交與洋人，豈知朝廷不能體恤忠臣，反而要你大人納賄三百萬兩方能批准。（萬古恨 1903，103）

小說中所描述的「文明國」現實令讀者無法不與目的語社會聯繫起來。偽譯者藉由洋人以及既得利益者之口，揭露政府的黑暗與腐敗無能，體現了小說作者的深思熟慮，為革命提供了合理性與正當性。

小說也對當時的當權者進行了猛烈抨擊。當權者名「熏天女皇」，整天「逍遙行樂，只吃飯不做事，只殺百姓不殺敵人」，「從他即位以來，不知吃了幾許敗仗，頂倒還要賠償兵費」，「單單兵費一件，已經賠了十萬萬十萬萬元了」（萬古恨 1991，227）。這段描述很難不讓讀者將「熏天女皇」與慈禧太后以及八國聯軍侵華、甲午中日戰爭清廷慘敗、割地賠款等事聯繫起來。黃禍後來改名黃轉福進入學堂學習，認識了名為「鍾國仁」的同學，這些描述都有理由讓讀者認為，《自由結婚》裏所描述的皆是國族的現實。

因此《自由結婚》反映的皆是國族現實，很難說「激活」了某個（些）「原文」文本，該小說的很多內容也與目的語中的諸多文本形成互文。《江蘇》雜誌主編鄒容於1903年發表《革命軍》一文，被譽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反清革命的第一篇檄文，是中國版「人權宣言」。而據馮自由（1981）回憶，張肇桐彼時正為《江蘇》雜誌的記者，小說中的很多思想與鄒容的《革命軍》有很多相似之處。如《革命軍》中說「中國之所謂二十四史，實一部大奴隸史也」（鄒容 2002，49）。《自由結婚》說：「那一部愛國史記裏面，上下數千年熱熱鬧鬧，原來沒有甚麼別的東西，只是強盜賊爺爺相爭相奪的事情罷了……毛賊再不會

做，做做服服帖帖的奴隸」(萬古恨 1903，68—69)。《革命軍》中鄒容也使用「文明國」來指稱中國。如果說《革命軍》是一篇正式的戰鬥檄文，那麼《自由結婚》則借用小說的形式，貼近讀者的閱讀偏好，以更為平實的語言直抵人內心。

小說中妓女聽到黃轉福的名字時，稱讚其名字婦孺皆知，「就是我們妓女，偶爾在《遊戲報》上看見了你的大名，也想仰望丰采」(萬古恨 1991，221)。該妓女也是深明大義，深受維新黨人思想的影響，針砭時弊，痛罵國人甘當亡國奴。《遊戲報》由李伯元於1897年在上海創刊，1910年停刊，在內容上著力於當時吸引市民的最世俗的領域——花(青樓藝妓)、伶(戲子)兩界，在上述兩界中有廣泛的讀者群，尤其在妓女中享有廣泛的讀者群。李伯元(1980，453)在論及《遊戲報》的辦報理念說道：

豈真好為遊戲哉？蓋不得以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當今之世，國日貧矣，民日疲矣，世風日下而商務日亟矣。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顧景之不暇，尚何有桓舞酣歌，樂為故事而不自覺乎？然使執途人而告知日，朝政如是，國事如是，是猶聚喧聾跛僻之流，強之為經濟文章之務，人必笑其迂而譏其背矣。故不得不借遊戲之說，以隱寓勸懲，亦覺世之一道也。

《遊戲報》並非真的一味追求娛樂，玩世不恭，而是要「借遊戲之說」，來達到「隱寓勸懲」的覺世之道；另一方面又表達了為避免「人必笑其迂而譏其背矣」，辦報要吸引群眾興趣的商業理念。「隱寓勸懲」也貫穿其中，《遊戲報》上有許多寓言小品，都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對社會時事進行的辛辣嘲諷。這裏由妓女口中說出該報，也在無形中強化了該小說與目的語文本和文化的互文關係。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圖里(Toury 2005)所認為的偽譯會在相當程度上「誇大」(偽)原語的特點在該偽譯小說中表現的並不明顯。該小說語言本身並沒有出現「誇大」所謂「原語」特徵的現象，語

言符合目的語文字特徵，這符合當時的翻譯規範：即梁啟超1902年譯《十五小豪傑》所謂「譯意不譯詞」（梁啟超1997c，64）。所謂誇大原語語言特徵如翻譯腔等拗口的表達不符合時代的翻譯規範，從周氏兄弟1909年直譯的《域外小說集》所受到的冷遇可見一斑。《自由結婚》主要以目的語社會現實為依託，與目的語社會中的文本與文化形成互文關係。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自由結婚》語言通俗易懂。該小說發表日期離白話文運動尚有時日，而作者卻使用白話文，不得不說體現了作者的深思熟慮。清末影響力巨大的翻譯家，如嚴復、林紓等，傾向於使用古雅的桐城派文字來翻譯，這就使得譯作的讀者局限於受過教育的民眾，不利於思想的傳播。而白話文的使用，無疑擴大了閱讀群體，有利於革命思想的傳播與接受，契合了作者行動主義者的身份。

現有偽譯研究也認為，偽譯者多會自稱作品譯自享有更高地位的語言文化，如十九世紀初俄國偽譯者宣稱譯自英國的「哥特式小說」（Gothic novel）或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希伯來文學中大量充斥著所謂「譯自英語」的偽譯作品（Touy 2012, 51），都是宣稱譯自所謂強勢語文化。《自由結婚》聲稱原文為英文，作者為猶太人，乃是猶太人用英語書寫本族的悲慘遭遇。聯想到二十世紀初猶太人的遭遇，顯然作者是想借猶太人的淒慘境地類比當時中國的情景。作者在文章中借洋諷中，借由猶太老人的口，名義上批評猶太人，實則是對當時社會的嘲諷：「無奈我猶太人都是個冷血動物，一點兒沒有愛國的心；都是個散沙亂石，一點兒沒有團結的力」（萬古恨1903，2）。魯迅的偽譯《斯巴達之魂》也借用希臘歷史來激勵當時的青年（齊金鑫、李德超2021）。可見所謂的「強勢」語言或文化在當時的社會並非偽譯者所倚重的，偽譯者更傾向於從弱小民族中尋找靈感，或借外諷今，或借外鑒今，以獲得讀者的同理心，達到激勵國人的目的。

2.4 偽譯的目的和動機

「自由結婚」一詞經過晚清革命派鼓吹後，為各地開明人士所實踐，逐漸成為革新派「家庭革命」的具體行動（楊聯芬 2014，165），因此「自由結婚」之概念體現的是革命精神，以該概念作為小說名字，體現了作者的革命立場。該文大力提倡男女平等，這在當時不啻為一種先進的思想。男女平等的思想不僅由黃禍和關關所宣導，甚至連未曾受過教育之人，如關關的乳母，也大聲疾呼：

現在世界上面，公理一天天的明白起來，這男女之間是平等的……古人說，男陽女陰，所以男尊女卑。這種放屁說話，我聽都不要聽了。那男陽女陰自然不差，但是陽類不見得是尊的，陰類不見得是卑的，難道就可以憑著陰陽論尊卑嗎……尊卑在乎品格，不在乎陰陽。（萬古恨 1903，62-63）

小說中的「光復黨」成員「盡是女中鐵漢，痛心疾首，一副寡婦面孔，日夜只要報仇」，她們中「沒有一個不會打槍，沒有一個不會放炮，沒有一個不知兵法」（萬古恨 1991，232），她們對社會的憎恨與鞭撻不亞於男性。在面對「異族」官員審判時，巾幗女英雄如玉大義凜然，氣概絲毫不輸男子：

我愛民族主義，比愛我丈夫還要情深萬倍。我犧牲了自己，把鮮紅的血塗在民族主義上面，把他弄得刀槍不入，水火不傷。我死的一天，就是民族長成的一天，好快活，好快活，卻叫你賤種哭得要死。（萬古恨 1991，272）

通過對這些女光復黨員的描述可以得知，作者沒有被傳統的性別觀念所束縛，對女性委以革命重任，這也體現了社會中女性意識的覺醒。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後，社會中存在著「尚武」精神，提倡暴力革命，暴力的提倡者不僅有男性還有女性。清末時期，暴力被革

命者認為是合情合理的行為，「對於男性而言，暴力行為標誌著與過去皇權時代頹廢文人的形象相割裂；對於女性而言，提供了一個可以宣揚男女平等的平臺」(Edwards and Zhou 2011, 486)。因此偽譯者通過宣揚男女平等的觀念，將女性所受的壓迫歸咎於清政府，使女性也抱有同仇敵愾之念，共同加入到推翻政府的事業中去。

該小說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中流傳甚廣的一些進步思想。小說中多次談到「盧騷」(今譯「盧梭」)。甚至一些腐朽保守人士，也說出這樣的話：

還有一件最要緊的，就是不准讀外國書，因為那外國素來是被髮左衽之邦，不知有父，不知有君。記得從前有個盧騷，講甚麼天賦人權，鬧得歐洲百姓，個個都變成叛逆的性質，直到如今，餘毒還沒有盡。
(萬古恨 1991, 246)

從中可以看出清末時期譯書已經對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為了揭露與批判保皇派的荒謬言論、喚醒國人革命熱情，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翻譯了大量西方政治學書籍，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意》、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對當時的民眾起到了啟蒙的作用。如鄒容(2002, 10)就曾提到：「吾幸夫吾同胞得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

小說同時也呼籲國人應該增強主人翁意識，視自己為國家的主人，國家並非是某個人私有的：「我們國裏的人，向來不曉得自己有了這件最貴重的國家，各人都以為國家與他無干，自己棄了主人翁的權利，把大權都交托給一二個人」(萬古恨 1991, 227)。「主人翁」、「權利」等頗具現代意義的詞語，突破了片面「仇恨異族」的局限，使小說立意有了進一步的提升。

偽譯為目的語文化打破「既有模式」(sanctioned patterns)，並為引入「新奇元素」(novelties)提供了一個便捷且相對安全的方式(Toury

2012, 48)。有學者談到該小說將愛情線索與愛國主義相融合，開啟了後世該類流行小說的先河(周鈞韜等 1993)。中國古代小說「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梁啟超 1997b, 53)，而《自由結婚》雖以愛情為名，但整部小說都是在宣揚尚武精神，鼓吹革命，一改以往小說兒女情長的特點，不啻為一種創新。

既然是鼓吹革命，宣揚暴力，言辭難免會激烈，很難逃過權力機構的審查，因此出於規避審查的目的，偽譯者有時候會打著翻譯的旗幟(Toury 2012)。由於翻譯在目的語文化多元系統中處於次要的位置(Even-Zohar 1990)，翻譯的旗幟可以為作者表達敏感或極端觀點提供便利，在面臨權力機關的審查時享有更大的寬容度。《自由結婚》一文言辭頗為激烈，對於清政府的抨擊絲毫不加掩飾，因此不排除作者為了規避權力機構的審查而稱其為翻譯作品。

張肇桐1901年赴日留學，彼時赴日留學生在日本創辦了多種報刊雜誌，有的刊名頗具地方色彩，如《浙江潮》以及《江蘇》等，這些雜誌多宣揚革命思想。巧合的是，魯迅此時也正在日本同文書院學習，在《浙江潮》雜誌上發表的其創作生涯中的第一篇作品《斯巴達之魂》(1903年)同為偽譯，該小說借由希臘歷史中的斯巴達故事激勵國人，宣揚「尚武」精神，特別是故事後半部分，借由妻子以死明志的故事，表現出女子在保家衛國方面也不落於男人(齊金鑫、李德超 2021)。《自由結婚》與《斯巴達之魂》所表現的主題內容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只不過前者言辭更加激烈。同一時期偽譯作品的不斷出現一方面說明了當時清政府對於言論的管控使得作者不得不假翻譯之名宣傳革命思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風氣，即與原創作品相比，翻譯作品更受讀者的歡迎、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¹

偽譯者的動機各異，有時是為了引進某種文學體裁(Toury 2012)，或是出於商業、性別、語言推廣、權力、歷史編撰、文學試驗等(Tahir-Gürçağlar 2014)動機，但無論是《斯巴達之魂》還是《自由結婚》，作者都不是出於上述動機。結合上述具體的分析可知，作

者都是為了宣揚某種精神或革命理論，藉以鼓動讀者。偽譯可以讓作者假翻譯之名宣揚激進的觀點，為作者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利。與文學性動機較強的偽譯相比，這一時期偽譯的政治性動機更強。與「抵抗」相比，偽譯更多的體現了行動主義翻譯中的「介入」。偽譯者通過在文本中提出明確的政治主張，號召民眾積極行動起來革命，介入了目的語的社會變革進程，表現出了主動式的行為。因此偽譯不僅僅是一個文本，更體現了一種鮮明的行動主義行為。可以說偽譯者充分利用了翻譯對目的語文化和社會的變革甚至顛覆作用，在偽譯文本裏盡情釋放自己的政治主張。

張佩瑤 (Cheung 2014, 241–249) 曾經將晚清行動主義翻譯分成四類：「變革行動主義 (transformative activism)，即超個體 (supra-individual) 系統的完全改變；改革行動主義 (reformative activism)，即超個體系統的部分改變；救贖行動主義 (redemptive activism)，即個人的完全改變；漸變行動主義 (alterative activism)，即個人的部分改變」。這四類並非界限分明的，比如魏源與林則徐的翻譯主要是改革行動主義，但也有漸變因素；梁啟超的翻譯主要目標是救贖，但最終志向為變革。倘若將清末時期的行動主義翻譯視為連續體，從保守端到激進端依次為：漸變、救贖、改革以及變革行動主義。如果說 1894 年後，「對歐洲社會與政治思想的翻譯與改革密切相關」(Liu 2020, 446)，那麼晚清社會的最後幾年，行動主義翻譯越來越向變革一端傾斜。而《自由結婚》可以視作變革行動主義的集中體現，偽譯者的行為體現出強烈的變革行動主義，最終追求的是推翻清政府，實現政權的完全改變，因此該偽譯體現了行動主義翻譯最激烈的形式。

(三) 結語

通過對《自由結婚》這篇偽譯小說進行詳細的文本分析以及結合時代背景，本文認為該偽譯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動機。無論是偽譯

的實現形式、所參照的「原語」文本、所使用的語言以及其創作目的與動機，都帶有鮮明的行動主義特點，服務於偽譯者強烈的政治訴求。該小說言辭之激烈以及革命態度之鮮明，體現了特殊歷史時期偽譯者作為行動主義者的身份。與翻譯相比，偽譯可以擺脫「忠實」與「對等」的束縛，為偽譯者的自由創作提供了空間，同時可以規避權力機關的審查。

也許就文學性而言，該小說有其局限性。小說對於人物的刻畫過於刻板、臉譜化。除了革命黨人，其他民眾盡是無知、愚昧、落後之人，都壞的很徹底。誠如學者批評該小說的那樣：「其缺點是理想多於現實，議論多於描寫，尤其是人物的年齡、身份與其思想水準很不協調，因而削弱了作品的真實性」（馬良春、李福田 1991，2094）。該小說在宣揚革命的同時，排滿思想鮮明，流露出濃厚的大漢族主義傾向。與《新中國未來記》等政治小說相比，《自由結婚》並未對未來的國家發展展開想像或描述，小說也未對推翻政府後的發展道路提供答案。但本文認為這一時期的偽譯作品不能僅以文學或美學價值來衡量，而應該置身於更廣闊的政治以及社會背景中。與真正的翻譯相比，偽譯體現出了更加鮮明的政治動機。偽譯者借翻譯的旗幟，積極參與到彼時的政治進程之中，與政治活動遙相呼應，體現了鮮明的行動主義立場。

致 謝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項目「清末民初偽譯小說的行動主義研究」（22YJC740061）階段性成果。

注 釋

1. 根據學者樽本照雄（Tarumoto 1998）的統計，從1902年到1907年，翻譯小說的數量超過了原創小說的數量。

參考文獻

- 阿英(1996)。《晚清小說史》。北京：東方出版社。
- 陳文新、毛偉麗(2006)。〈略論晚明白話小說「托名」現象〉。《明清小說研究》，第4期，頁10-28。
- 戴光榮(2018)。〈清末民初翻譯對現代性的促進——從林紓翻譯序跋談起〉。《中國科技翻譯》，第4期，頁55-58。
- 杜貴晨(2000)。〈《儒林外史》假託明代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1期，頁100-104。
- 馮自由(1981)。《革命逸史·第三集》。北京：中華書局。
- 郭豫適(2001)。《半磚園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胡翠娥(2003)。〈不是邊緣的邊緣——論晚清小說和小說翻譯中的偽譯和偽著〉。《中國比較文學》，第3期，頁69-85。
- 克非(2016)。〈從《紅樓夢》的「緣起」談小說的作者〉。《中華文化論壇》，第5期，頁29-35。
- 李伯元(1980)。〈論《遊戲報》之本意〉。魏紹昌編，《李伯元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453-454。
- 梁啟超(1989)。〈滅國新法論〉。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華書局，頁32-47。
- (1997a)。〈譯印政治小說序〉。陳平原、夏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37-38。
- (1997b)。〈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陳平原、夏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50-54。
- (1997c)。〈「十五小豪傑」譯後語(選錄)〉。陳平原、夏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64。
- 馬良春、李福田(1991)。《中國文學大辭典·第四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齊金鑫、李德超(2019)。〈假作真時真亦假——清末民初第一部偽譯偵探小說揭示的文化和文學現象〉。《中國翻譯》，第6期，頁42-51。
- (2021)。〈魯迅小說斯巴達之魂的偽譯解讀〉。《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第2期，頁15-22。
- 湯哲聲、朱全定(2014)。〈清末民初小說的翻譯及其文學史價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2期，頁33-41。
- 萬古恨著，自由花譯(1903)。《自由結婚(第一編)》。上海：自由社。

—— (1991)。〈自由結婚 (第二編)〉。章培恒、王繼權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頁 103–286。

王東風 (2011)。〈一首小詩撼動了一座大廈：清末民初「哀希臘」之六大名譯〉。《中國翻譯》，第 5 期，頁 20–26。

王宏志 (1999)。《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新小說報社 (1997)。〈中國唯一之文學部「新小說」〉。陳平原、夏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 (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58–63。

楊聯芬 (2014)。〈「戀愛」之發生與現代文學觀念變遷〉。《中國社會科學》，第 1 期，頁 158–180。

楊淑華、王峰 (2019)。〈清末政治小說的譯介及翻譯現代性問題〉。《外語教學》，第 4 期，頁 83–87。

岳凱華 (2018)。〈《佳人奇遇》：梁啟超的翻譯緣由與對中國政治小說的影響〉。《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頁 37–43。

張道振 (2013)。〈偽譯的成因、功能和現代變異〉。《外語教學》，第 1 期，頁 99–103。

趙稀方 (2012)。《翻譯現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譯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周鈞韜、歐陽健、蕭相愷編 (1993)。《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自由花 (1903)。〈弁言〉。萬古恨，《自由結婚》。上海：自由社，頁 1–4。

鄒容 (2002)。《革命軍》。北京：華夏出版社。

鄒振環 (1996)。《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Cheung, Martha (2014). “Rethinking Activism: The Power and Dynamics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1840–1911).” In *Text and Context: Essays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Honour of Ian Mason*, ed. by Mona Baker, Maeve Olohan, and Maria C. Pérez, 237–258.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Edwards, Louise, and Lili Zhou (2011). “Gender and the ‘Virtue of Violence’: Creating A New Vision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Through the 1911 Revolution.”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6 (4): 485–504.

Even-Zohar, Itamar (1990).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 (1): 1–268

Genette, Gérard (1997).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Gould, Rebecca R., and Kayvan Tahmasebian (2020).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Activism in the Time of the Now.”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 Activism*, ed. by Rebecca R. Gould, and Kayvan Tahmasebian, 1–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ill, Michael Gibbs (2011). “No True Men in the State: Pseudo/Translation and ‘Feminine’ Voice in the Late-Qing.”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10 (2): 125–148.
- Liu, Jane Qian (2019). “Pseudotranslation, Intertextuality and Metafictionality: Three Case Studies of Pseudotranslation from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erspectives* 27 (3): 389–403.
- Liu, Kuan-yen (2020). “Late-Qing Translation (1840–1911) and the Political Activism of Chinese Evolutionism.”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Activism*, ed. by Rebecca R. Gould, and Kayvan Tahmasebian, 439–46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izzi, Andrea (2008). “When a Text Is Both a Pseudotranslation and a Translation.” In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vestigations in Homage to Gideon Toury*, ed. by Anthony Pym, Miriam Shlesinger, and Daniel Simeoni, 153–16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ahir-Gürçağlar, Şehnaz (2014). “Pseudotranslation on the Margin of Fact and Fiction.” In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ed. by Sandra Bermann, and Catherine Porter, 516–527. Oxford: Wiley-Blackwell.
- Tarumoto, Teruo (1998). “A Statistical Survey of Translated Fiction 1840–1920.” In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 ed. by David E. Pollard, 37–4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oury, Gideon (2005). “Enhancing Cultural Changes by Means of Fictitious Translations.” In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Studies in History, Norms and Image-Projection*, ed. by Hung Eva, 3–1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2012).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ymoczko, Maria (2000). “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ctivism, Social Change and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Geopolitical Shifts.” *The Translator* 6 (1): 23–47.
- (2010a). “Translation, Resistance, Activism: An Overview.” In *Translation, Resistance, Activism*, ed. by Maria Tymoczko, 1–22. Amherst an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2010b). “The Space and Time of Activist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Resistance, Activism*, ed. by Maria Tymoczko, 227–254. Amherst an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